

# 秦观词

## 新释辑评

纤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

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主编 叶嘉莹  
◎编著 徐培均 罗立刚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秦观词

## 新释辑评

■ 徐培均 罗应刚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  
书局

责任编辑：陶 玮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秦观词新释辑评

徐培均 罗立纲 编著

---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4 千字

印张：11.5

印数：0 001—3 000

书号：ISBN 7-80663-156-9/I·184

定价：24.00 元

---

敬告读者

本丛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作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芟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陞”。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作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做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喻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 前言

宋词有多种风格，但一般认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sup>①</sup>于是苏轼被推为豪放派的首领，秦观被推为婉约派的巨擘。如清人先著《词洁》卷三称少游为“词家正宗”，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又云：“《淮海词》一卷，宋秦观少游作，词家正音也。”因此秦观在词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当前淮海词的研究，已取得较高的成就。然大半就词论词，领域尚未拓展出去；又多侧重于前期描写恋情的词作，虽也逐步探讨后期的谪恨词，然涉笔未深。我们认为词虽小道，却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和词人的生活，因此也应采用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的方法加以研究。我们细读淮海全集，愈觉秦观的诗文及其身世对于探讨淮海词的底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秦观虽以词名家，但明人胡应麟却说：“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作渠帅，世遂寡称。”<sup>②</sup>诗词异体而同源，对于同一作者而言，研究他的词，似不应离开他的诗，也不应离开他的文。现在试结合淮海诗文探讨一下淮海词。

## 一、淮海词与科举失意

淮海词清丽凄婉，窈眇深微，“知乐者谓之作家歌”<sup>③</sup>；而“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也”<sup>④</sup>。这种风格

的形成，主要植根于作者的个性和才情。综观少游一生，他个性较柔弱，感情较细腻，思想较悲观。他在未入仕前，虽也年少气盛，理想高远，但在仕途上一遇挫折，便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这种思想演变过程，见之于陈师道《秦少游字序》，云：“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力致，而天下无难事。……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他的诗词创作中。宋元丰元年（1078年），他赴京应秋试，落第而归，不胜颓丧。彼时东坡曾作书慰之：“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sup>⑤</sup>又作诗云：“秦郎文字固超然，汉武凭虚意欲仙。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sup>⑥</sup>东坡对待此事态度非常明确，他既对少游卓越的才华表示肯定，又对主考官的误失人才感到遗憾。可是少游自己却始终想不开，他在《次韵参寥三首》其二中说：“长安仕路与云齐，倦仆羸骖不可跻。但得玄晖曾折简，何须平子更安题！”似乎已经想通；然而在此题其三中说：“且折花枝醉复醒，人间时节易峥嵘。屠龙肯自羞无用，画虎从人笑不成。”情绪一落千丈，内心充满着矛盾与痛苦，对前途似乎已丧失信心。

淮海词宋本现存七十七首，此外我又辑得几首。在这八十几首词中，抒写落第心情的作品并不多。清人周济曾评其《满庭芳》（山抹微云）词云：“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又云：“君子因小人而斥。”<sup>⑦</sup>当是注意到词人仕途失意这一点。证之以此词下阕所云“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愈觉周氏之说切中肯綮。然而我更觉得抒写落第心情最集中的莫如《画堂春》，词云：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此词若从表面看，不过是抒写春怨春恨。然细加考证，则与应举有

关。词云“杏园憔悴杜鹃啼”，非一般写春景，而另有寄托。杏园故址在今西安市大雁塔南，唐时为新进士游宴之地。《秦中岁时记》云：“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则二使皆有罚。”故唐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曾云：“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宋人胡仔早就看出此点，他在《茗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中指出少游此词上阕是“用小杜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小杜诗题作《杏园》，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引《旧唐书·宣宗纪》云：大中元年（847年）三月敕：“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杜牧之作，当写落第后的感伤。少游既然少慕杜牧之为人，对此诗的用意不可能不了解。另外宋人常以长安指代汴京，如前引少游《次韵参寥三首》之二便是；此处则以长安杏园指代汴京琼林苑，例如杨侃《皇畿赋》云：“彼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琼林而是名，亦玉辇而是待。其或折桂天庭，花开凤城，则必有闻喜之新宴，掩杏园之旧名。”又周城《宋东京考》卷十一云：“琼林苑在新郑门外，俗呼为西青城，乾德中建，为宴进士之所。”可见北宋亦依唐例，新进士常在琼林苑宴集，故诗文中常以杏园代之。

此词既写落第心情，那么究竟作于何时？是否与前引《次韵参寥》为同时之作？曰否。少游宋元丰八年（1085年）中进士，此前赴京应举有二次，首次在宋元丰元年（1078年），乃秋试；第二次在宋元丰五年（1082年）恰在春季，有《辇下春晴》诗云：“楼阙过朝雨，参差动曙光。衣冠纷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蔫（yún）花困日长。经旬辜酒伴，犹未献《长杨》。”此诗采入《王直方诗话》，谓是和参寥子，结二句曾作“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因而遭到孙莘老的批评。词中所写时令，与此诗相合，而地址亦复相同。词云“水平池”，指琼林苑之北的金明池，故杨侃《皇畿赋》云：“彼池之南，有苑何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载：“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池中有

桥，“桥面三虹，朱漆阑榭”，“临水近墙，皆垂杨”。此种景色，皆与词境吻合。因此，词写宋元丰五年（1082年）春季应礼部试后落第心情，是无庸置疑的。

诗与词同样写落第心情，然而词胜于诗不知凡几。一般说诗境宽、词境狭，如王国维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而少游此处则相反。其《次韵参寥三首》，语直意浅，了无余味。而《画堂春》词，则境界凄迷，感情深挚。近读《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谓“合时与地，遂成境界”，此说可与王国维之“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sup>⑧</sup>参合使用。以之衡量少游此词，如合符契。少游词既写了“落红”、“弄晴小雨”、“杜鹃啼”与“春归”，点明了暮春三月的时令；又写了“池（金明池）”、“杏园（琼林苑）”以及园内“柳外画楼”的阑干，这些便都是地点。然而只停留在时与地仍嫌不够，因为一般的文学作品那怕是新闻报道也容易做到时与地合。此外还必须将特定的时地即时间与空间组成景色或画面，并在其中融入作者独特的感情，这样才能构成写景如在目前，抒情则沁人肺腑的境界。少游在暮春三月的琼林苑中，面对片片落红，霏霏小雨，而声声凄苦的鹃啼，似在报道“春归”，又似在说“不如归去”，落第之人，逢此境况，情何以堪！上阙着重写景，然情寓景中，宛然如画。下阙着重写情。这时词人独自登上园内画楼，凭阑无语，默默地捻着手中的花枝。接着又将花枝放下，向着西下的太阳含恨凝思。这里主要表现词人的动作与神情，纯以虚出，蕴藉无穷，耐人寻味。有的论者仅仅欣赏其含蓄美、朦胧美，如清人沈谦《填词杂说》云：“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著一实语，败矣。康伯可‘正是销魂时候也，撩乱花飞’，晏叔原‘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秦少游‘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深得此法。”但也有的论者以意逆志，探求作者的心境，如清人黄蓀《蓼园词选》评此词云：“按一篇主意只是时已过而世少知己耳，说来自娟秀无匹。末二句尤为切挚。花

之香，比君子德之芳也，所以撝者以此，所以无语而对斜晖者以此。既无人知，惟自爱自解而已。语意含蓄，又撩开朦胧的面纱，窥测作者的心境，大半是说到点子上的。所谓“一篇主意只是时已过而世少知己”、“既无人知，惟自爱自解”云云，就十分接近东坡“见解榜不见太虚名字……但弔有司之不幸尔”<sup>⑩</sup>的本意。虽然东坡说的是元丰元年那一次，而蓼园所指为本年，但其精神实质不无类似。

以少游同样描写落第心情的诗词对比，可见“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sup>⑪</sup>。淮海词风调柔媚，韵致杳眇，意内言外，曲折幽深。如果说《满庭芳》（山抹微云）词是在个别词句中“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那么此首则是全篇如此，若不以淮海诗相印证，恐难窥其堂奥。

## 二、淮海词与元祐党争

宋代神宗、哲宗两朝有新旧党之争。秦少游认为这种党争，乃属正常社会现象：“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能免也。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sup>⑫</sup>因此，他在政治上并未避开党争，而是紧随其师苏轼，积极参与。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少游尚未入仕途，故未见其出来反对，只是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流露某种不满。可是元祐年间，他初为蔡州教授，继又入京供职秘书省，和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列苏门，人称“四学士”。这一时期朝中旧党分裂，以程颐为首形成洛党，以苏轼为首形成蜀党，而以刘挚、梁燾、王严叟、刘安世为首形成朔党。新党章惇等人是他们共同的政敌，此时大都在野，冷眼旁观，伺机复辟。宋元祐三年（1088年），秦观应制科，进策有《朋党论》上下篇，主要针对洛党，因此被“诬以过恶”<sup>⑬</sup>，罢归蔡州。在蔡州所写情词《水龙吟》又大受程颐谴责。他抓住其中“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二句，乃曰：“高高在此，岂可以此渎上帝！”<sup>⑭</sup>刘克庄对此有深刻的见解，

云：“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昉于唐而盛于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脱换李贺语尔，而伊川有褻渎上穹之诮，岂惟伊川哉！”<sup>⑭</sup>可见少游之陷于党争，不仅出于政见不同，他的文艺观、特别是词作，也是遭到洛党攻讦的重要把柄。直至宋元祐七年（1092年），他由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迁正字，由洛党投靠朔党的贾易率先上了一章，“诋观不检之罪”，接着，原来推荐秦观的赵君锡又上章言“其薄于行，愿寝前荐”<sup>⑮</sup>，于是才二月而罢。所谓“不检”或“薄于行”，无非是指责少游善为小词，流播于青帘红袖之间。

宋元祐八年（1093年）七月，宰相吕大防荐少游为国史院编修，未及二月，支持旧党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政局孕将变之机。翌年（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试进士，李清臣策题始有绍复新政之意。见此情势，少游预感到旧党以及自己有被斥的可能，写了两首词。一首是《望海潮》其三，云：

梅英疏淡，冰渐溶洩，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此为少游名作，论者极多。此处只想指出两点。其一，上阕起三句，表面是写自然界气候之变化，实乃以象征手法，暗寓时局之变化。“换”字是一篇之旨，清人周济谓“以两‘到’字作眼，点出换字精神”<sup>⑯</sup>，确是精到之见。所谓“作眼”，乃指词眼。刘熙载云：“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sup>⑰</sup>照此说法，则“换”字非但本词精神所在，亦且为“通体之眼”，而两“到”字则为“数句之眼”。以两个“数句之眼”烘托一个“通体之眼”，则‘换字精神’愈益突出。何以词



人如此专注于“换”字，实用以暗示时局之转换。其二，全篇以时空的组合与转换，营建曲折幽深的境界。乔大壮评美成《解语花》云：“以异地而生情景，足见北宋词家境界。”<sup>⑩</sup>又评美成《少年游》云：“‘当时’、‘今日’，此词家划分时地，创造境界之法。”<sup>⑪</sup>在北宋词家中，少游可称运用此法的高手。细玩此词，乃宋绍圣元年（1094年）春重游王诜西园时所作，上阕前三句写眼前春色，继三句忆从前俊游。以今日汴京之游，切入昔时洛阳之景，今昔交错，恍如电影之蒙太奇、化出和淡入，镜头在不知不觉中转换。此即乔氏所谓“以异地而生情景”所创造的境界。词中“长记”以下至“飞盖妨花”，跨越上下两阕，进行大段忆昔，其中又分两小段：前一小段自“长记误随车”至“乱分春色到人家”，写少年情性；“絮翻蝶舞”，点时令；“柳下桃蹊”，兼及时空，“人家”则指地点。这一小段回忆为泛写，未识是在汴京或洛阳，然与以上所写早春景色相照应，构成一种清新妖丽的境界。其法亦是异地异时，自然组合与转换。换头三句为后一小段，乃忆昔年西园雅集。西园雅集乃北宋文坛盛事，当时李伯时曾绘图志之，米元章又为文以记，尔后刘克庄、虞集、袁梅等相继作长篇跋尾，皆具载与会人物。而赵孟頫等又不断临摹《西园雅集图》以传世。香港罗抗烈教授认为雅集之时在宋元祐二年（1087年）五月<sup>⑫</sup>，然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武林韵山堂本《苏诗总案》卷二十八，实列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后。窃以为后者似可信。宋元祐二年（1087年），旧党执政，正所谓风云际会，盛极一时，王诜身居戚里，“池籀服玩，极其华缛”<sup>⑬</sup>，又喜与苏轼等文士交游。在他的西园雅集，固值得少游的留恋与回忆。这美好的回忆当因前片所写的春景所引起，然今日重来，物是人非，倍增怅触。“兰苑”以下五句，即纾此情怀。这一小段以昔日西园之盛会，比今日西园之萧条，地虽相同而景物已变：昔日是“华灯碍月”，“飞盖妨花”，今日则“烟暝旗斜”，“时见栖鸦”。可见词人在同一手法的运用上又善于变化：以异景代异地，在鲜明对比中又构成了一种以乐衬哀悲惋深挚的境界。结尾二

句进一步拓展，从眼前写到将来。眼前的心情是“无奈”，因感到政局之不稳也；将来所至之处是“天涯”，谓将被斥逐也。根据词人以往在党争中所遭到的打击，这份耽心是合乎生活逻辑的。这一段是以今时今地与他时他地相组合，也构成了一个凄迷怨断的意境。统而言之，此篇不断运用时空的结合与转换，营建了抚今忆昔哀乐无端的艺术境界，寄托了词人生活上与政治上的欢娱与忧患。应该说它离不开元祐党争这一历史背景。

比《望海潮》（梅英疏淡）略晚，少游又有《江城子》其一，写被逐离京的心情。其上阕云：“西城杨柳动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西城，指汴京顺天门外之金明池、琼林苑一带。《淮海集》卷九有诗题作《西城宴集》，自注：“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上巳，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可为佐证。词云“碧野朱桥当日事”，盖指彼时宴集而言。所谓“动离忧”，即指将离汴京。歇拍“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一如《望海潮》歇拍“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皆写将被远谪的忧愁，然因情势迫近而忧愁更为沉痛。前人对此评价极高，如俞陛云云：“结尾二句与李后主之‘一江春水向东流’、徐师川之‘门外重重迭迭山，遮不断，愁来路’，皆言愁之极处。”<sup>②</sup>词人若非遭遇元祐党争的沉重打击，是不可能写出如此表现“愁之极处”的词句的。词中也是以时地相合、情景交融构成境界，而放逐之感则同样是在艳情之中。

少游所耽心的党祸终于降临。宋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他以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方至楚泗间，有诗云：‘平生逋欠僧房睡，准拟如今处处还。’诗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职，监处州酒税。”<sup>③</sup>在处州期间，有《千秋岁》词，云：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  
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鹄